

社会资本对林区创业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王明天 梁媛媛 薛永基

摘要：生态保护是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证，故林区农户在创业的同时要对生态进行保护。本文基于福建、江西等地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林区农户创业过程中社会资本对其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构成林区农户创业资本的家族资本、政府资本与邻里资本中，只有家族资本能够直接促使林区农户在创业过程中采取生态保护行为，而政府资本则使得林区农户的创业行为对生态保护产生负面影响，邻里资本对林区农户创业过程中的生态保护行为则没有影响。这表明，林区农户在创业过程中的生态保护行为符合经济人假说，林区农户对创业的负外部性重视不够。基于模型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应将生态保护政策与林区创业农户的家庭利益、家族利益相结合。

关键词：社会资本 农户创业 生态保护 林区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国是面临生态威胁最大的国家之一。林区农户是生态保护的最重要利益相关者，在中国对生态环境进行抢救式保护的过程中，他们更多地被认为是威胁者。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林区发展的矛盾，是提高林区农户生态保护积极性的关键点（Karamidehkordi, 2010; Kideghesho et al., 2007）。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的下达与实施，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逐渐明晰，为林区农户提供了创业的条件与机会。从2008年开始，林区农户创业进入迅速发展阶段。林区农户创业行为与生态保护间的关系得到了社会的更多关注。

林区农户创业行为对生态环境有直接影响。一些林区农户在创业过程中产生生态保护行为，主要体现在开展森林旅游、保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森林水源等方面（张颖、宋维明，2012）；而另一些

*本文研究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基于社会生态动态的林农创业复杂系统仿真模拟研究”（项目编号：2016JX07）、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面向京津冀城市群消费的城郊农民创业驱动因素与培育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6YGB009）资助。

林区农户在创业过程中采取生态破坏行为，主要体现在生态公益林丧失、林木滥伐、生态多样性减少等方面（赵绘宇，2009）。Nepal and Spiteri（2011）的研究成果表明，林区农户对生态保护的态度越积极，在生态保护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就越少。影响林区农户生态保护态度的因素有很多。众多研究发现：森林资源的权属状况、林区农户受教育程度、对野生动物肇事的经济赔偿、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政府政策等，都对林区农户的生态保护意愿有重要影响（Karanth and Nepal, 2012; Kathleen et al., 2006; Khadka and Nepal, 2010; Kideghesho et al., 2007; Lundstrom et al., 2007; MacMillan and Phillip, 2010; Weaver and Lawton, 2008; Wesuls and Lang, 2010）。Kideghesho et al.（2007）采用条件价值法对生态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愿进行了研究，发现支付值大大小于补偿值。这说明，由于生态保护区地区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为了鼓励与促进生态保护区农户进行保护生态的活动，政府应当给予一定的补偿，如经济补偿。林区农户发展生产的行为与生态保护行为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内部收益外部化的问题，即生态保护收益与生态保护成本之间相差过大（Nepal and Spiteri, 2011）。林区农户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承担了大部分成本，但生态环境保护的效益遍及整个区域甚至整个国家，因此应当由国家的代表——政府出面统筹，在政策层面和市场层面调和林区农户生产与生态保护行为的关系（Lundstrom et al., 2007）。

除了政府行为、政策因素之外，有研究指出，社会资本也与生态保护紧密相连（宋言奇，2010）。谭荣（2012）对陕西省安康市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社会资本是显著影响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因素的结论，并提出社会资本的社区性特点和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性特点是影响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主要因素。张方圆等（2013）利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发现农户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规范程度、信任维度均对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劳动力数量的提高会提升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而户主年龄、农户拥有的草地面积和耕地面积的增加会降低该意愿。Johansson-Stenman et al.（2009）的研究成果表明，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可以使交易费用大大减少。Putnam（2000）认为，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有助于集体行动中的广泛合作，并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尤其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农户贫困减少和收入改善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Abdul-Hakim et al., 2010; Grootaert, 1999; Grootaert and Swamy, 2002），从而减缓农户经济诉求与生态保护间的矛盾。Narayan and Pritchett（1999）研究了坦桑尼亚农村地区的村庄社会资本，发现村庄社会规范和社团关系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的影响，更好的社区公共服务、更紧密的社区合作和优良的社会信用体系使得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产生直接影响。

纵观现有文献，关于林区农户生态保护及其创业行为的研究集中在各类生态保护政策、社会资本等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以及各类生态保护政策对林区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而将社会资本、林区农户创业、林区农户生态保护等议题相联系，直接对三者间关系进行的研究还较为薄弱。为进一步研究社会资本通过林区农户创业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本文拟分析社会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在林区农户创业过程中的作用，即社会资本可决定林区农户在创业过程中采取生态保护或是生态破坏行为。一方面，各项社会资本的出资者通过创业投资影响甚至控制林区创业

农户的生态保护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社会资本的支持，创业林区农户自主选择是否进行生态保护。从逻辑上讲，如果一项社会资本能促使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产生，在确定各类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作用效果后，通过对社会资本组合的控制可使林区农户创业行为向生态保护的积极层面发展。因此，研究社会资本对创业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山西省、河南省等地林区农户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验证社会资本构成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社会资本构成对林区农户创业过程中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过去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局限于林区农户环境意识、环境满意度、生态保护动力、收入状况等方面，而忽略了社会资本的影响。为此，本文在分析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主要研究社会资本对林区农户在创业过程中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

农户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往往相对匮乏，并且金融约束对农户是否创业和行业选择等决策有着重要影响（Ahlin and Jiang, 2008），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的替代机制（李树、陈刚，2012），是创业者获取有利资源条件的重要凭仗（Sam et al., 2014）。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所提及的社会资本定义为有创业意向的林区农户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能够获得并能够促使其创业行为发生的资源。郭盈军（2006）认为，农户创业是依托家庭、邻里或其他组织，通过投入一定的生产资本扩大现有生产规模或者从事新的生产活动，以实现财富增加并谋求发展的过程。许多研究表明，政府扶持是农户创业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Ardichville et al., 2003; David, 2006; Eckhardt and Shane, 2003; Fonseca et al., 2001; Klappera et al., 2006）。在此前提下，本文将创业林区农户能够获取的社会资本划分为家族资本、政府资本、邻里资本三类。其中，家族资本是指创业林区农户或其家族内部其他成员为促使创业行为发生而提供的资本；政府资本体现为政府部门为林区农户创业行为提供的创业支持，如小额贴息贷款、科技服务、创业课堂等（薛永基、翟祥，2012）；邻里资本是通过林区农户之间信息与资本共享所形成一种新的资本，体现为林区农户之间紧密联系而形成的技术交流、信息流通、规模效应等。

（一）政府资本、邻里资本与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

一方面，政府作为公共管理部门，谋求社会与生态和谐发展是其管理目标之一；另一方面，随着就业压力增长，鼓励创业成为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途径。政府希望通过对林区农户创业行为进行经济和政策上的扶持，在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达成生态保护的管理目标。因此本文认为，政府资本能够制止林区农户在创业过程中产生生态破坏行为，促使其进行生态保护。由于林区创业区域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林区农户在创业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能波及邻里日常生活。任何人都希望所生活的区域内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本文认为，邻里资本会促使创业林区农户产生生态保护行为。政府资本、邻里资本与林区农户创业行为对生态环境影响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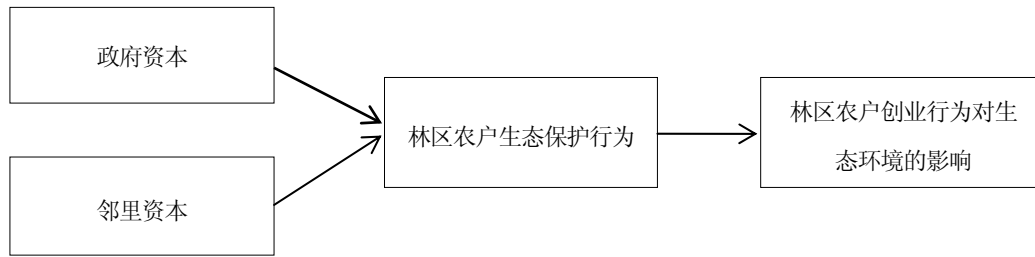


图1 政府资本、邻里资本与林区农户创业行为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逻辑关系

据此，本文提出政府资本、邻里资本与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之间关系的假说：

H1：政府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H2：邻里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二）家族资本与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

家族资本与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相关性是不确定的。一方面，林区农户的选择充满经济理性（参见罗必良，2004），出于对未来发展的短视和经济利益的追求，林区农户可能采取生态破坏行为，则家族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创业区域在林区范围内，林区农户出于对居住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可能采取生态保护行为，则家族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具有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家族资本与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之间关系的假说：

H3：家族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三）家族资本与政府资本、邻里资本

在中国农村，由于有以家户为中心的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存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圈子，在这个包含了嫡亲、宗族、邻里的社会圈子中，各类社会资本之间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晰，以创业林区农户的家族资本为中心会衍生出其他资本形式。例如，林区农户社会圈子中的某一个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则该农户由此可获得的政府扶持、政策优惠等资源可视为一项家族资本，而从邻里处获得的有效信息和技术支持均可以看作其家族资本的衍生。在此条件下，仅考虑林区农户获得的政府资本和邻里资本对其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就忽略了与其关系更为密切的家族资本，从而使研究失去意义。而仅考虑家族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而不考虑实际存在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亦不切合实际。鉴于此，本文将两者结合，在考虑家族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影响的同时引入政府资本和邻里资本两个外部影响因素。在家族资本与政府资本、邻里资本方面，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4：家族资本对政府资本具有正向影响；

H5：家族资本对邻里资本具有正向影响。

本文的研究逻辑为：家族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并通过政府资本和邻里资本两个外部因素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产生间接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逻辑和5个研究假设，本文构建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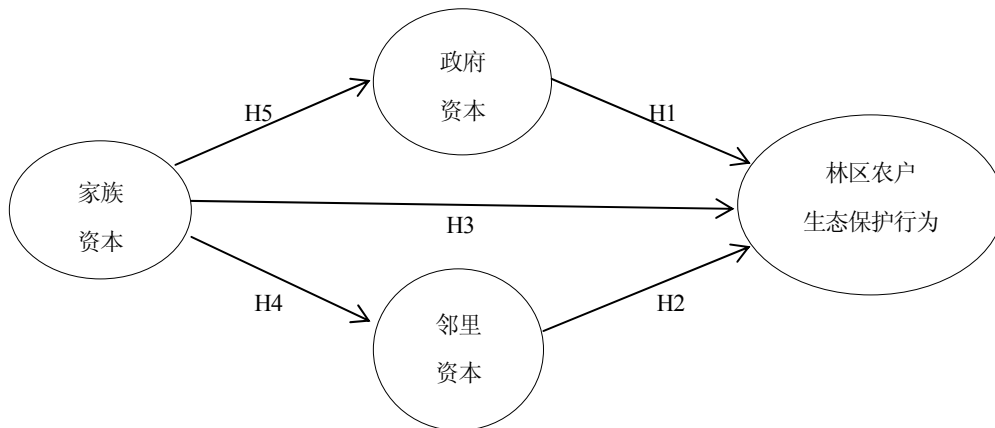


图2 本文研究概念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 资料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实施林权制度改革的诸多省份，包括山西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在调查实施前，课题组按照林业资源分布状况对农户进行抽样；抽样完成后，在北京林业大学招募了“回乡调研”志愿者，采用上门访问和问卷填写的形式于2016年1~2月对林区农户实施了调查。由于创业林区农户占各省总农户的比例相对较小，并且创业林区农户分布较为分散，所以，在总共发放的500份调查问卷中，回收问卷380份。在剔除调查对象不属于创业林区农户的问卷后，本文研究共获得有效问卷283份。按照Tinsley（1987）以及Comrey（1988）的建议，如果量表题项数小于40题，中等样本量约为150个，较佳样本量为200个。可见，本文研究样本在数量上基本可以满足后续研究的需要。

(二) 研究量表

本文研究共涉及家族资本、政府资本、邻里资本、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4个变量，均可通过量表进行测量。在测量时，本文采用Likert7级量表。针对各个题项，调查对象选择“1”表示对此题项的陈述“非常不同意”，选择“4”表示中性，选择“7”表示对此题项的陈述“非常同意”。其中，家族资本采用5个题项测量，具体为：①你家族内部有人从事你创业的相关行业；②你经常会从家族内部获得相关行业的信息；③你从事该行业是受家族内部其他成员行为的影响；④你在从事该行业的过程中经常受到来自家族内部其他成员的指导和鼓励；⑤你的家庭、宗亲在你创业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资本采用4个题项测量，具体为：①你认识很多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②政府提供资金支持；③政府为产品销售提供支持；④政府组织生产、销售等培训。邻里资本采用5个题项测量，分别为：①很容易了解行业内其他产品的生产情况；②邻居之间经常沟通、协作；③经常与外村、镇上相关组织联系，交换信息；④很容易从外部获取信息；⑤从外部渠道获取的信息正确、及时、有效。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采用3个题项测量，分别是：①我在生产生活中尽量

使用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产品；②我会有意识地生产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产品；③我在生产中会考虑节水或节电。

（三）模型选择

按照本文的研究设计，家族资本、政府资本、邻里资本之间存在多重关系的可能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能较好实现既定研究目标。其原因是，结构方程模型有多个优点，包括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测量误差、同时估计因子结构和因子关系、容许更大弹性的测量模型以及估计整个模型的拟合程度。

结构方程模型包括两套理论方程。其中，结构方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用来界定潜在自变量（家族资本、政府资本、邻里资本）与潜在因变量（政府资本、邻里资本、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之间的线性关系；测量方程（measurement equation）用来界定潜在变量和观察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各方程如下：

结构方程：

$$\eta = \gamma\xi + \beta\eta + \zeta \quad (1)$$

内衍变量（因变量）的测量方程：

$$Y = \lambda\eta + \varepsilon \quad (2)$$

外衍变量（自变量）的测量方程：

$$X = \lambda\xi + \delta \quad (3)$$

(1) ~ (3) 式中， η 是向量矩阵， γ 是回归矩阵， ξ 是向量矩阵， β 是回归矩阵， λ 是回归矩阵， ε 和 δ 是方差或协方差矩阵。

四、实证分析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本文进一步检测了所使用量表的效度和信度。本文借助第一批回收的 180 份有效问卷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变量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5，特征值均大于 1，说明本文研究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同时，量表各因子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 0.7，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Stevens, 2009）。因此，效度和信度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研究量表有效测量了家族资本、政府资本、邻里资本和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 4 个变量，可以用于后续研究。

表 1 因子分析结果

类别	测量项目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系数
家族资本	你家族内部有人从事相关行业	0.882	0.928
	你经常会从家族内部获得相关行业的信息	0.903	

社会资本对林区创业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你从事该行业是受家族内部其他成员行为的影响	0.898	
	你在从事该行业的过程中经常受到来自家族内部其他成员的指导和鼓励	0.757	
	你的家庭、宗亲在你创业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0.837	
政府资本	你认识很多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	0.643	0.853
	政府提供资金支持	0.864	
	政府为产品销售提供支持	0.847	
	政府组织生产、销售等培训	0.863	
邻里资本	很容易了解行业内其他产品的生产情况	0.673	0.872
	邻居之间经常沟通、协作	0.675	
	经常与外村、镇上组织联系, 交换信息	0.860	
	很容易从外部获取信息	0.884	
	从外部渠道获取的信息正确、及时、有效	0.832	
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	我在生产生活中尽量使用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产品	0.924	0.911
	我会有意识地生产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产品	0.936	
	我在生产中会考虑节水或节电	0.115	

(二)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本文使用 AMOS17.0 软件和 SPSS16.0 软件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优性。在 AMOS17.0 软件中建立如概念模型的 SEM 路径, 从 SPSS16.0 软件中导入数据, 得到了表 2 的检验结果。该方程拟合程度比较好, 卡方自由比为 3.152, 拟合优度指数为 0.902, 规范拟合指数 0.911, 比较拟合指数为 0.930, 近似误差的均方根为 0.081。从结果来看, 假说 H2、H3、H4 和 H5 成立, 但本文检验结果并不支持假设 H1。具体来看:

首先, 家族资本能够直接促使创业林区农户采取生态保护行为, 其可能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林区农户创业区域位于以家族居住地为圆心的社区范围内; 二是在农村地区, 家族(宗族)的文化和制度对家族中的个人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农村, 家族(宗族)有聚族而居、居住地相对稳定的特点(杨善华、刘小京, 2000), 家族中任何成员都不希望世代代生存空间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因而家族成员在创业过程中会采取生态保护行为。此外, 家族(宗族)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具有组织原则, 且由家族中长老担任管理者, 家族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家族组织原则以及管理者对个体的限制都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家族中的创业个体为获取经济利益而采取生态破坏行为。

其次, 政府资本会导致林区农户不采取生态保护行为这一结果, 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最突出的例证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这个制度建立的初衷, 是想通过对主要发挥生态效益的各类生态公益林进行必要的补偿, 以换取拥有生态公益林的林区农户保护生态公益林的积极性。但是,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设立, 在一些地方诱发了新的引资冲动, 即通过扩大生态公益林范围争取到国家更多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林区农户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中得到的利益却很少, 远

低于他们从事木材生产等经营活动的机会成本，很难调动起他们加强森林保护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带来的正效应。同时，林区农户取得政府资本的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也会引发其生态保护行为的缺失。一般而言，林区农户是通过与政府单位办事人员良好的人际关系取得政府资本的。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政府资本会导致以下几个后果：一是政府资本投资林区农户创业行为的门槛降低，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林区农户创业项目可能得到政府资本的支持；二是由于与政府单位办事人员的良好关系，林区农户认为可以逃避政府部门对其生态破坏行为的处罚，进而有恃无恐，以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三是政府单位办事人员对林区农户创业过程中的生态破坏行为监管不力，甚至故意纵容其违法、违规行为。可见，政府支持林区农户创业的规章制度及其执行流程需要优化。

最后，邻里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较弱，其可能的原因是差序格局的存在。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中心，由人及人地向外延伸使私人联系增加，最终构成一个网络（费孝通，2012）。在以林区农民个人为中心的人际网络中，同样存在关系亲疏之分。在涉及近亲利益的情况下，林区农户会顾虑近亲的利益；而在仅涉及街坊邻里利益条件下，林区农户则会以自身利益为大。因此，在提及林区农户在生存空间内的生态保护行为时，家族资本对其有直接影响，邻里资本则无显著影响。归根结底，这是小农意识中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公共意识淡薄的缘故。

表 2 SEM 相关路径检验指标

假设	路径	路径系数	标准误差	临界比值	显著性水平
H1	政府资本→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	-0.143	0.067	-2.130	0.033
H2	邻里资本→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	0.073	0.041	1.783	0.075
H3	家族资本→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	0.184	0.062	2.948	0.003
H4	家族资本→政府资本	0.252	0.063	4.016	0.000
H5	家族资本→邻里资本	0.249	0.079	3.161	0.002

综上所述，家族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存在如下路径（见图 3）：路径 1 为家族资本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直接影响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路径 2 为家族资本通过政府资本影响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在这条路径中，政府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影响为负；路径 3 为家族资本通过邻里资本影响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在这条路径中，邻里资本影响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仅在 10%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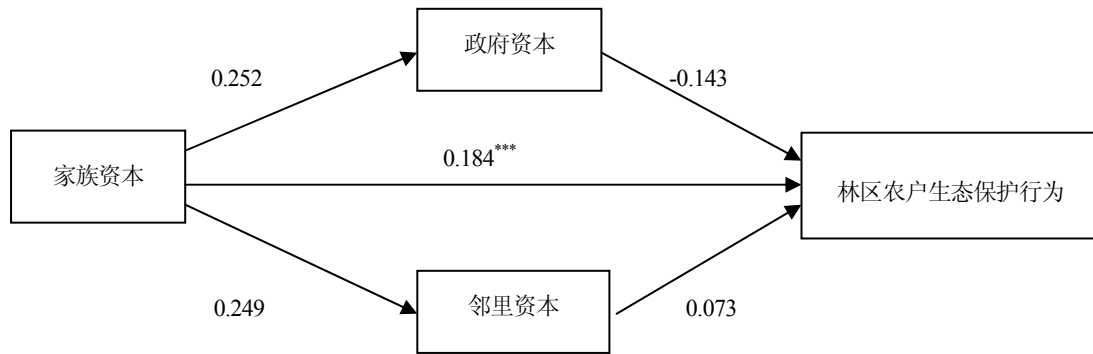


图3 SEM模型路径图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林区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家族资本、政府资本、邻里资本和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从结果可以看出，在构成林区农户创业资本的家族资本、政府资本与邻里资本中，只有家族资本能够直接促使林区农户在创业过程中采取生态保护行为，政府资本的支持会导致林区农户的创业行为对生态保护产生负面效应，而邻里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并无影响。由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可总结为两点：第一，家族资本与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之间关系密切，表现为家族资本可以促使林区农户进行生态保护；第二，在获得政府资本支持后，林区农户会忽略其创业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产生负面效应。

家族资本促使创业林区农户产生生态保护行为主要得益于家族群体与文化对家族个体成员的影响。因此，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在政策上做到：①将生态保护政策与家庭利益、家族利益相结合，以引起林区农户对生态保护的重视。这是政府设计林业生态保护政策的一个新领域。过去政府及林业主管部门在设计和制定农村林业政策时，往往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发挥农村集体及传统集体林场作用等方面。随着集体林权制度的不断深入，许多新型农村林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其中包括家庭林场、林业承包大户等形式。这些新型农村林业经营主体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更多地依靠或依托家庭、亲属、家族或关系亲密人员。因此，政府在制定支持林区农户发展林业、加强生态保护的政策时，要高度重视这些新型农村林业经营主体，克服重集体组织、轻民营主体的倾向，尊重并发挥中国农村传统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固有优势，给予这些新型农村林业经营主体更大的倾斜，保护并鼓励他们从事林业创新经营的积极性。②鉴于政府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有负向影响，一定要强化政府对生态保护的主体意识，使其承担起生态保护的主体责任，全力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③鼓励家族资本投资林区农户创业行为，在造林和抚育补贴等财政性支持政策和农村小额贷款、农户抵押贷款等金融性扶持政策方面更多地向家庭林场、林业承包大户等家庭（族）式经营主体倾斜。④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管理与自我管理，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等民间传统鼓励、约束机制的作用，扩大邻里资本对林区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监督作用，限制和克服家族资本容易产

生的利己性冲动。

参考文献

- 1.费孝通, 2012:《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郭盈军, 2006:《中国农民创业问题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3.李树、陈刚, 2012:《“关系”能否带来幸福?——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 4.罗必良, 2004:《提倡向农民学习——基于农民经济理性的经济学解释》,《农村经济》第8期。
- 5.宋言奇, 2010:《社会资本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人文杂志》第1期。
- 6.谭荣, 2012:《陕南秦巴山区农户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7.薛永基、翟祥, 2012:《资源获取预期对林农创业意向影响的实证研究——个体心理特征的中介作用》,《农业技术经济》第7期。
- 8.杨善华、刘小京, 2000:《近期中国农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9.张方圆、赵雪雁、田亚彪、侯彩霞、张亮, 2013:《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资源科学》第9期。
- 10.张颖、宋维明, 2012:《基于农户调查的林权改革政策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分析》,《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第5期。
- 11.赵绘宇, 2009:《林权改革的生态风险及应对策略》,《法学》第12期。
- 12.周菁华, 2012:《转型期我国农民创业:行为、风险及激励——以重庆市为例》,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3.Abdul-Hakim, R., N. A. Abdul-Razak, and R. Ismail, 2010, “Does Social Capital Reduce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erengganu, Malaysia”,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4(14): 556-567.
- 14.Ahlin, C., and N. Jiang, 2008, “Can Micro-credit Bring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6(1): 1-21.
15. Ardicville, A., R. Cardozo, and S. Ray., 2003, “A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8(1): 105-123.
- 16.Comrey, A. L., 1988, “Factor Analytic Methods of Scale Development in Personality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6(1): 754-761.
- 17.David, N., 2006, “Develop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erprise in Europe’s Peripheral Rural Areas: Some Issues Facing Policy-makers”,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4(1): 41-60.
- 18.Eckhardt, J. T., and S. Shane, 2003, “Opportunities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 29(3): 333-349.
- 19.Fonseca, R., G. P. Lopez, and C. A. Pissarides, 2001, “Entrepreneurship: Start-up Costs and Employ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4): 692-705.

20. Grootaert, C., 1999,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1. Grootaert, C., G. Oh, and A. V. Swamy, 2002,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Burkina Faso",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1(1): 4-38.
22. Johansson-Stenman, D., O. M. Minhaj, and P. Martinsson, 2009, "Trust and Relig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Economica*, 76(303): 462-485.
23. Karamidehkordi, E., 2010, "A Country Report: Challenges Facing Iranian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uman Ecology*, 38(2): 295-303.
24. Karanth, K. and Nepal, S. K., 2012, "Local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Benefits and Losses From Protected Areas in India and Nep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49(2): 372-386.
25. Kathleen, A., P. K. Galvin, and J. R. Thornton de Pinho, 2006, "Integrated Modeling and its Potential for Resolving Conflicts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People in the Rangelands of East Africa", *Human Ecology*, 34(2): 155-183.
26. Khadka, D., and S. K. Nepal, 2010, "Local Responses to Participatory Conservation in Annapurna Conservation Area, Nep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45(2): 351-362.
27. Kideghesho, J. R., E. Røskoft, and B. P. Kaltenborn, 2007, "Factors Influencing Conservation Attitudes of Local People in Western Serengeti, Tanzania",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16(7): 2213-2230.
28. Klappera, L., L. Laevena, and R. Rajan, 2006, "Entry Regulation as a Barrier to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2(3): 591-629.
29. Lundstrom, C., S. Kytzia, and A. Walz, 2007, "Linking Models of Land Use, Resources and Economy to S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Regions(ALPSCAP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40(3): 379-393.
30. MacMillan, D. C., and S. Phillip, 2010, "Can Economic Incentives Resolve Conservation Conflict: The Case of Wild Deer Management and Habitat Conservation in the Scottish Highlands", *Human Ecology*, 38(4): 485-493.
31. Narayan, D., and L. Pritchett, 1999, "Cents and Sociability: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7(4): 871-897.
32. Nepal, S. K., and A. Spiteri, 2011, "Linking Livelihoods and Conservation: An Examin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Perceived Linkages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Livelihood Benefits around Nepal's Chitwan National Park",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47(5): 727-738.
33.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34. Sam, W., S. Arzlanian, and T. Elfring, 2014, "Social Capital of Entrepreneurs and Small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9(1): 152-173.
35. Stevens, J., 2009, *Applied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5th revise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Academic.
36. Tinsley, H. E., 1987, "Use of Factor Analysis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Research",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4(4): 414-424.

37. Weaver, D. B. and L. J. Lawton, 2008, "Perceptions of a Nearby Exurban Protected Area in South Carolina,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41(3): 389-397.

38. Wesuls, D. and H. Lang, 2010, "Perceptions and Measurements: The Assessment of Pasture States in a Semi-arid Area of Namibia", *Human Ecology*, 38(2): 305-312.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of social capital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behaviors of entrepreneurial forest farmers in the forest zones

Wang Mingtian Liang Yuanyuan Xue Yongji

Abstract: Ecological protection is the significant guarantee to the sustainable use of forest resources. Therefore, forest farmers should protect ecology in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is paper, influences of the social capital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behaviors of entrepreneurial forest farmers during their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are studied with empirical methods 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obtained from Shanxi and Henan. It is found that the family capital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behavior directly, but the government capital has a negative impact, and the neighborhood capital has no effect on the behavior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behaviors of forest fame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can be portrayed by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man while the extern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is ignor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olicy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family profit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forest farmers.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Entrepreneurship of Farmers; Ecological Protection; Forest Zone

(作者单位: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白 描)